



1921—1949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发展概要

●主 编 朱祥丰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发展概要

(1921——1949)

主编 朱祥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沈阳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概要
(1921—1949)

Dang de Luxian Fangzhen Zhengce Fazhan Gaiyao

主编 朱祥丰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东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6,000 开本: 787×1092¹/₃₂ 印张: 10,125

印数: 1—7,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连凯

版式设计: 任 何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郑 祯

ISBN 7-205-02228-2/D·438

登记号: (辽)新登字1号

定价: 5.10元

序 言

尚 文

党的历史一再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只有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其发展过程，对于我们加深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概要》一书，系统地、完整地介绍了我党在近七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概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的历史渊源，了解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客观必然性和具体内容，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之间的区别和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得和失，从而使我们从中认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帮助我们加深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理论的认识，提高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都是十分有益的。

目 录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发展和完善	1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的依据	1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过程	3
第二编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
一、“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21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	23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完善和成熟	27
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胜利，实现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29
第三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	33
一、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33
二、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条件	34
三、党的“二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36
四、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38
第四编 总路线	41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41
二、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总路线	50
三、党的“七大”路线	59
四、党的群众路线	67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的提出、发展和完善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理论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在它指导下取得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的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和列宁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这就阐明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1850年马克思指出，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中国，使中国的社会已经处于社会的变革，不久的将来“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1853年马克思又从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预言到“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

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这是指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指出：“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页）怎样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呢？列宁指出：“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选集》第1卷第591页）“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别无他法的。”（同上第551—552页）列宁坚持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出：“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同上第634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他在论述东方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时，①强调各国共产党“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

性”。（《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②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同上第275页）③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同上第336页）

列宁这些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国家革命思想，就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第一次大革命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抗日战争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 第一次大革命中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

帝国主义的压迫。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如何进行革命，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1）正式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二大《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491—492页）（2）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将发展成为革命的领袖军。《宣言》指出：“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同上第491页）（3）提出共产党应该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组成民主统一战线。《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苦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同上第492页）从中可以看出二大《宣言》在中国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比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了进步。但是“二大”还有不足之处：①虽然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但是对于

两步革命的相互关系还认识不清；②虽然提出工人阶级将发展成为革命的领袖军，但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并没有提出来；③虽然提出要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但对工农联盟如何组织统一战线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三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主要问题，也是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

1923年6月，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进一步提出：“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同上第529页）“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同上第530页）这是党的“一大”和“二大”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在理论的形成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次会议，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作了错误的估计，三大《宣言》中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同上第522页）这反映出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底由谁来领导的问题，认识还不成熟，这是出现“二七”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及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三大闭幕以后，接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这个指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指示中指出：“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策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就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同上第519页）并指出实现工

农联盟就必须实现“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且把这种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同上第519页）这个指示还指出：“共产党必须继续影响国民党赞助土地革命，……还必须在国民党内尽量防止孙中山和军阀之间的联盟，……必须尽快要求召集一次国民党的会议。”（同上第519—520页）为了贯彻共产国际这一指示，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会议指出了要加强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工农联盟，决定在国民党内建立我党的组织。这次会议弥补了三大的不足。

三大以后，我党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方法，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

党的四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四大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特别是在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在《对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从两方面论证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无产阶级来领导。一方面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来论证中国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的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命运。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183页）另一面从世界革命的发展上，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无

产阶级来领导。“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们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得到胜利”。（同上第183—185页）

四大还充分地论述了农民的作用。在《议决案》中指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份，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同上第183页）在《对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93页）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革命的外部条件和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趋向，而得出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参加，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抓住主要同盟军——农民，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这是对党从建党以来关于中国革命基本认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在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三大提出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和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弥补了二大、三大之不足。因此说四大已从原则上开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党的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没有形成。因为四大虽然从原则上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

题，但是没有论述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有“天然领导权的思想”，表现在《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中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说成是民族运动中的一种自然的趋向，对民族资产阶级估计也不足，认为它“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同上第133页）因此，领导权会自然而然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特别是在国共合作中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没有把领导权问题和革命的第一阶段究竟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也没有提出，同农民联盟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历史和实践的限制，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四大以后，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的出现，由于五卅反帝大风暴中，各阶级的表现，为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客观条件。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又在四大的基础上大大地提高一步，初步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1页）

1925年2月28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和贯彻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的通告。这之后，党的领导人邓

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李大钊、周恩来等都先后发表了文章，分别从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关系等问题进行论述。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里，强调了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他说：“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然去取得一切权力，那么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5页）

瞿秋白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指出：“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上第247页）说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权的必要性。

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强调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44页）他指出了“耕地农有”是广大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而这种要求“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同上第137页）这篇文章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弥补了四大的一个不足之处。

1925年冬至1926年之间，毛泽东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词》、《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对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的前途的影响》、《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意见，进一步提高了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

毛泽东指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430页）

第二，关于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比较全面、系统、深刻的。他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关于农民，毛泽东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45页）关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页）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关于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

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同上第4页）

第三，关于政权问题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同上）这“仅仅是一个幻想”

（同上第5页）因为“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409页）

以上这些问题都说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

但这个时期党还不能完全正确地把握革命的方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说，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也就是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

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大革命失败，使党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1927年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又进了

一步，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并开始有了行动。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更前进了一步，主要表现：（1）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中国革命现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97页）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2）肯定了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六大《决议》指出：“建立工农革命军，……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今后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底根据地，……。”（同上第306—307页）六大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六大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仍然不适当地强调城市领导的作用，没有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对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缺乏正确的估计，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的敌人。《决议案》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同上第298页）这实际上是没有划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六大前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了武装起义，在实践中逐渐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并集中全党的智慧，总结了一些经验。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